

北京口述历史

定宜庄 主编

生在城南

定宜庄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 京 口 述 历 史

生在城南

定宜庄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在城南 / 定宜庄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7. 2

(北京口述历史)

ISBN 978 - 7 - 200 - 12287 - 9

I. ①生… II. ①定… III. ①北京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0826 号

北京口述历史

生在城南

SHENG ZAI CHENG NAN

定宜庄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5.25 印张 350 千字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2287 - 9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总序

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 80 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

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 20 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①

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 5 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 1949 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

^① 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

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

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

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

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

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

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

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

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

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

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

作者谨识

2016年2月

序言

外城也称南城，是相对于内城而言的。清军入关，将京城汉人悉数驱赶到外城，外城从此成为汉人亦即相对于旗人的“民人”聚居之所。内城在北，外城居南，彼此被一重城墙阻隔。有清一代，八旗官兵固然不得随意迁往外城，外城民人想要在内城长久安居也同样困难，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亡，甚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仍没有彻底打破。我访问的诸多人士中，汉人后来居住于内城者有之，但旗人无论宗室平民，却少见居住于外城者，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当然除外。

京城旧时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皇城四系指皇城四门，内九系指内城九门，其中前三门即宣武门、正阳门与崇文门，是内城九门中南面的三个门，是内外城之间往来的通道。至于外七，就是指南城的七门了，这七个门是：

南面：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

东面：广渠门、东便门

西面：广安门、西便门

如果说在内城那由九门及城墙圈起来的，是旗人的一个天地，那么外城这七个门及其城墙围起的这个城，却像是个可以对四面八方开放的地方，唯独对于旗人，它才是个禁区。

外城是五方辐辏之所，集中了从全国四面八方迁移而来的商人、小手工业者和从事五行八作的百姓；外城还是各地官僚、士子会聚的中心，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各种暗流涌动的革命思潮的策源地。外城还有林立的戏台、酒楼、饭店和妓院，是京城最热闹的娱乐场所……如果不去

深究，那么内城的文化确实显得封闭而单一，不似外城开放而丰富；内城作为大兵营所特有的清冷肃杀气氛，确实不似集聚了大小商号与手工作坊的外城繁华红火；内城的死气沉沉与外城的生气勃勃判然有别。外城人口的流动性，与驻守内城的八旗人丁的相对稳定，也构成了鲜明对比，内城的“旧”映衬着外城的“新”，难怪有学者认为，从功能上看，从社会空间联系上看，外城似乎比内城更像一个城市。^①以致很多北京史的研究者，都被外城的五光十色所吸引，甚至将它当作北京的精华、代表和中心，前些年宣传甚炽的“宣南文化”便是一例。受其影响，凡写老北京的作品，便总是津津乐道于前门外的繁华、宣武门外的会馆，还有天桥的把式。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也是事出有因。

外城自明以来，即有东西之分，以前门为界，东指崇文门外，西指宣武门外。清人震钧作《天咫偶闻》，便立“外城东”“外城西”两卷，称：“外城士夫多居城西，商贾皆居城东”^②。二者间有着明显差别，不可一概而论。

北京城从明清以来几百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不存在哪里才是精华、才是代表的问题。入清以来，内城的宫廷文化与旗人文化，与外城的汉、回等族群的文化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多元化特征。辛亥革命以后，南城流动的人口在不断地影响、冲击着内城人口的稳定，二者间的界限也在日益模糊，直到近年，宣武区与西城区以及崇文区与东城区的合并，导致了北京城几百年形成的内外城格局的最后消失。这个过程，也是本书关注的内容之一。

与在内城所做的访谈一样，我所做的口述的主旨，仍然是同一个，即这里生活着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处于哪种空间环境之下、哪种社会群体之中，有着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怎么记忆这个城市和他们

① 参见赵世瑜、周尚意：《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112—119页。

② （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35页。

祖先的历史，又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

清代北京内城的主要居民是皇室王公、八旗官兵及其家属，身份相对单一。而南城迥异，虽然人口未必多于内城，但南城的人员成分十分复杂，有富商巨贾，也有贩夫走卒；有北方流民，也有南方士子。这使我无法将我在外城所做的访谈，像在内城那样按照社会群体予以分类，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本来就很难被分别归入某个圈子。何况百年以来，他们还很少有人有能力和时间来编织自己的社会网络，很多人甚至还未找到自己归属的社会群体。这是外城流动人口多、迁徙频繁的结果，也是它仍然处于边缘而非中心位置的体现。

所以，本书的这些访谈，就都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顺序排列的。



1954 年的崇文门



1954 年的宣武门

目 录

序言 / 1

一、“天留忠骨伴将军” / 1

(一) 余幼芝口述 / 3

(二) 张有强(化名)口述 / 15

(三) 有关余家守墓十七代史事考(2008年) / 24

附录 重修广东旧义园记(同治七年) / 38

二、人生行脚的常态——乐崇辉、刘玉梅口述 / 40

三、阅尽人间春色——刘曾复口述 / 74

(一) 白首龟年识古津 / 76

(二) 闻道浮生戏一场 / 124

(三) 城南杂谭 / 147

四、髡髻悲欢数十载——马氏三兄弟口述 / 166

(一) 马崇年、马崇禧口述 / 167

(二) 马荣祥口述 / 191

(三) 马崇禧口述 / 213

附录 马连良的父母 / 235

五、不让须眉是此行——李滨、萧成口述 / 237

(一) 李滨口述 / 238

(二) 萧成(化名)口述 / 275

六、回民开的买卖——满恒亮口述/ 291

附录 叶祖孚：德源兴与铁宝亭/ 319

七、红尘内外与虚实之间——李荣口述/ 323

八、坛根儿下的日月——王春茂、严秀芹口述/ 369

后记/ 389

一、“天留忠骨伴将军”

〔访谈者按〕外城的开篇，从与袁崇焕有关的故事说起。袁崇焕之事发生在清朝入关前夕，那时北京无论内城外城都还为大明王朝的皇帝与子民占据，满洲宗室王公、八旗子弟尚未入城，所以这是本书中发生最早的一个故事。

袁崇焕（1584—1630），广西藤县籍，东莞人。明朝万历己未进士，任福建邵武县令。天启朝升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军山海关外，曾坚守危在旦夕的宁远孤城（今辽宁兴城），一战而击退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后金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既死，太宗皇太极继位，袁崇焕被明廷授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事务，对辽东事务，采取以和为守，以守为攻，乘机出战，以和谈为配合的方针，遭明廷指摘为“欺君”“诱敌胁和”等罪名。崇祯三年（1630年）清兵绕开山海关大路，由蒙古地经大安口入遵化，京师震动，举城戒严，袁崇焕率辽军入援，崇祯帝中皇太极所施反间计，以袁崇焕通敌罪将其下狱，于京城西市凌迟处死。崇祯这一自毁长城的昏庸之举，终于导致了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崇祯皇帝本人也自缢煤山的历史悲剧。

据《明史·袁崇焕传》：“（崇祯）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卷二五九）事实上，当时北京市民并未认为袁是冤屈的：“明年四月，诏磔西市，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刚者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袁之惨状与北京市民因不知情而表现出的仇恨与残忍，如今读来，仍令人心悸。

袁崇焕的冤案曾引得无数英雄感叹唏嘘。我国近代最出名的文论家梁启超将他称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他说广东地处岭表，在中国历史上鲜有如此“足以当一国之人物”。^①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之人，袁崇焕及其与之相关的故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需要而再次应运而生，而且迄至如今，仍是研究的热门，所以，它又是本书中绵延最久的一个故事。

在围绕袁崇焕发生的诸多故事中，近年流传最广的一个，是袁崇焕被害之后，曾有一位姓余的谋士将他的尸骨（或曰头颅，详见下面的考证）偷偷埋葬于北京城南的广渠门内，余家从此便世世为袁大将军守坟，历明至清，再历民国至解放，再经历“文革”等各种劫难，待终于传到余幼芝女士这里时，已然是第十七代。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近年来也确实感动了无数人。通过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报道，余女士和余家为袁大将军守墓的故事在北京城几乎家喻户晓，仅我从网上搜索的条目已达几千条——尽管我为余女士做第一次访谈时这个故事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广为流传。但与此同时，各种质疑、反对的声浪也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高，很多人提出，为袁大将军守墓十七代，这究竟是一件确凿的真事，还是仅仅是一个传奇？余家后人并不仅仅余女士一位，其他人为何无声无息？更有甚者，对余女士究竟是否真的是余家的后代，也提出了怀疑。

我为余女士做过第一次访谈之后，陷入其中已是身不由己，何况这件事已经触及口述史学科的“软肋”，即口述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正因为任何史料也不可能绝对真实，“校勘”才会成为史家的看家本领，成为史学训练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口述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这套功夫也应该同样适用。

我采用的方法无非还是那几个，一个是用文献来与口述互相参证。王国维早就提出过“二重证据法”，讲的是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的互

^① 梁启超：《袁崇焕传》，收入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证，口述与文献不也同样是二重证据么。再者，是取旁证，即寻找其他与此事相关者，听取他们的叙述和看法。还有一个，就是对被访者做深度访谈，并把几次访谈的说法进行前后对比。这三种，我都试了。出于种种考虑，我无法公开所有的访谈记录，所以这组口述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是我对余女士的第一次访谈，以及对与此事相关的张先生所做访谈的记录；第二部分是我将所做的访谈与文献互校之后撰写的、对有关史事的几点考证，属于我的考据癖发作，因其枯燥无味，尽可翻过去不看。我强调的是，这组访谈的重点，既不在于对袁崇焕的评价，也不在于对余家守墓一事的褒贬，而在于我探究“守墓十七代”故事的一个过程，也是我通过这一探究，对口述史研究方法做的一种探讨。坦率地说，这种探究比起这个故事本身，更能引发我的兴趣。

（一）余幼芝口述

时 间：2001年1月18日

地 点：北京市崇文区（今东城区）东花市斜街三号袁崇焕祠
旧址

访谈者：定宜庄、岑大利

在场者：焦立江（余幼芝之夫）

〔访谈者按〕这是我2001年第一次访问余女士之后写的访谈者记。毋庸讳言的是，我当时确实相信余女士所讲为事实，而且确实为袁崇焕和余义士的故事感动。

余幼芝，退休教师，原居住于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斜街五十三号。此处旧称余家馆，即袁崇焕墓之所在。近十余年来，史学界有关袁崇焕的研究一度成为热门，仅以袁崇焕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便召开过不止一次，余女士夫妇也曾应邀参加。我的同门、中央党校的岑大利教授就是2000年在辽宁兴城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他们初次相遇的。她回京后

对我讲述此事，我感兴趣，便随她一道，在2001年的冬月，冒雪专程到余女士的居所，一则对余女士与她的丈夫做口述访谈，一则瞻仰声名赫赫的袁大将军的英灵寄托处。

与学术会议相比，在被访者家中的谈话，因其特定的情境，感受与气氛自是不同。北京那年冬季多雪，当日京城路滑天寒，一片雪雾迷蒙。余女士那位于胡同中的逼仄潮冷的居所，与她谈话的激越高亢主题构成鲜明对比，至今犹令人难忘。

余女士的口述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第一是余义士盗袁崇焕头及余家后人世代守墓的故事，以及乾隆朝建袁崇焕祠、墓的由来。第二个内容，也是她说得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将祠墓毁坏后她奔走上诉的经过。第三个内容，是访谈者与余女士夫妇就民族气节与民族仇恨等敏感问题进行的对话，这是我当时想要做这次访谈的主要目的。从与袁崇焕相关的故事看几百年来的满汉关系，确是一个有意义的角度，因为明清之际的这段历史，毕竟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距今最近的一次剧烈的民族冲突，如何评价袁崇焕，又是对这一民族矛盾持何种看法与情绪的集中体现。

我们是以清史的研究者和满族人的身份来与余女士交谈的，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议论，以及所谈及的余女士祖父过继给满族家庭一事，细读起来都耐人寻味。

对袁崇焕评价的转折点，应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开始。自这年之后，清高宗以“立臣节”为宗旨，实施的一系列表彰为明捐躯的忠臣节烈、将投降清朝的明朝降官列为“贰臣”等举措，寻找袁崇焕的后裔，正是这些行动的组成部分。此时距清军入关已有百余年，清朝统治者已经大体完成了从异族入侵者到泱泱大国君主的角色转换，对他们来说，臣对君的效忠既然已成为保证统治稳定的大事，历史当然也就需要改写。不过，虽然乾隆帝的目的主要是出于稳定统治，但我却毋宁相信，当他细阅《明史》，读到有人壮烈赴死，有人颀颜投降，人格之高下判然可分之时，他对于黄道周等人发出“风节凜然，不愧一